

国内外教育参考

2010年第5期

主办: 北京邮电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2010年10月22日

本期目录

● 最新动态

刘延东: 落实好全教会精神和规划纲要 深化改革.....	1
九所顶尖大学校长探讨: 中国模式能圆世界一流大学梦吗.....	5
北航首次赴海外招聘骨干教师到“千人计划”各级人才.....	8
天津工大91个科研项目“海选”本科生.....	9
吉大数千名新生成为“名师班主任计划”首批受益者.....	10

● 国际观察

拥有四位诺奖得主的芝加哥大学如何诠释“一流”.....	10
良莠不齐的中外合作办学谁监管 上海开始试点.....	13
办学质量影响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洋为中用.....	1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留学中国计划》.....	17

● 专家论教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推进开放办学战略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2
哈尔滨理工大学校长李大勇: 依托行业 立足地方 走特色发展之路.....	26

● 经验借鉴

从欧洲模式到美国模式: 欧洲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趋势.....	29
欧美大学组织模式比较研究.....	35

● 最新动态

刘延东: 落实好全教会精神和规划纲要 深化改革

在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

部署实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这次电视电话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交流各地学习贯彻情况,安排下一阶段工作,重点部署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袁贵仁同志已经介绍了全国贯彻落实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的情况,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作了说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河南、云南6个省(市)的负责同志汇报了前一阶段学习贯彻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打算,讲得都很好。

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和教育规划纲要发布以来,各地各部门把学习贯彻作为重要任务,紧密结合实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目前已有25个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会议进行传达学习,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各省(区、市)正在抓紧制定本地教育规划纲要,积极筹备教育工作会议。二是各部门各单位齐心协力,抓紧研究出台重大政策措施。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承担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重大任务,着手研究制定配套文件和实施细则,争取尽快启动重大改革和发展项目。三是教育系统积极主动,以多种形式推进学习贯彻工作深入开展。教育部研究制定了贯彻落实工作计划,部党组成员分赴各地开展宣讲活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积极组织学习讨论,深入研究推进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四是全社会学习宣传持续深入,营造了贯彻落实的良好氛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各类学校到社会各界,积极学习和宣传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积极宣传和解读教育规划纲要,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高度评价,对教育改革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全国上下形成了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良好局面。

下面,我就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扎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是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根本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重视改革的系统设计和整体安排,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进一步消除制约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创新;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允许和鼓励各

地进行探索和试验。这些重要思想，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改革创新精神谋划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是这次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的基本原则。教育规划纲要通篇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从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扩大教育开放等六个重点领域对改革进行了系统设计；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改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形成终身教育体系，都提出了重大改革政策措施；为了切实推进改革、尽快见到成效，还专门提出了本届政府启动实施的十大改革试点。总的来说，教育规划纲要是一部以改革为动力、以改革促发展的规划纲要。

现在，教育改革方向已经明确，重大方针政策也已出台，关键是抓好实施。把改革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今天召开这次会议，集中动员和部署教育体制改革工作，就是要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行动进一步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以坚定的决心、积极的态度、扎实的举措、务实的作风，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二、准确把握新时期新阶段推进教育改革的总体要求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我们迎来了教育改革的大好机遇，具备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心很大。二是全社会对教育改革寄予厚望、关心支持教育改革，为教育体制改革营造了良好社会环境。三是 30 多年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为教育体制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四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从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来看，教育改革既涉及体制机制，也涉及思想观念，还涉及人的切身利益，社会期待很高，有些方面认识不尽一致。改革的难度大、压力大，矛盾也比较多，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从教育改革的艰巨性来看，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任何一项重大教育改革的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教育政策措施的出台，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失误或失败，可能耽误一代人或几代人。教育不改不行，乱改更不行。从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来看，办好教育是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推进教育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搞好教育改革必须统筹谋划，系统设计，试点先行，协同推进。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教育体制改革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关系亿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善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要坚持育人为本，尊重教育规律、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要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既立足基本国情，又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做法，努力冲破陈旧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要坚持服务大局，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and 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增强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第二，必须把握改革的基本原则。教育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一要因地制宜。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各级各类学校之间情况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限于一种模式，不强求一个尺度，切忌“一刀切”，避免简单化。二要尊重首创。基层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只有各地各校紧密结合实际，针对实际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大胆探索和试验，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不断加以实践和完善，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对在改革实践中涌现的新思路、新做法，只要有利于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都应予以保护和支持。三要广集众智。教育改革是否成功，关键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实践效果是否可行。在改革方案的制定、改革举措的实施、改革经验的推广中，要以召开论证会、听证会、专家咨询会、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充分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评议。四要谨慎操作。教育改革复杂而又敏感，每项改革都可能有风险，出台政策时必须认真分析各种情况，事先做好应对预案。既要坚持方向，又要关注细节，妥善处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于重大、复杂、敏感的改革，要建立风险评估机制，把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第三，必须抓住改革的关键环节。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多层次、多领域的体制机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教育改革要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着眼于破除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突出矛盾，为教育发展增添动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增强信心，力争在四个方面取得新突破。一要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推进教育内容和课程教材、考试招生和评价制度改革，探索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二要在办学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推进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水平。三要在管理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建立健全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四要在保障机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这4个方面既是系统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各地各校在推进改革试点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实际，抓住主要矛盾、重点问题、关键环节，通过重点突破实现整体推进，提振改革信心，取得明显成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

第四，必须掌握改革的科学方法。这次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涉及面广、面临情况复杂、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把握科学的方法。一要做到“上下结合”。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体现着国家意志，教育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制度必须由国家统一制定。但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管教育的是各级政府，办教育的是各个学校。学校的实际情况如何，教育改革的效果如何，包括校长、老师在内的一线教育工作者，还有学生和家长往往是最清楚的。任何一项改革，只有既得到学生、家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支持，又符合国家的要求，才能真正推行、取得成功。二要做到“左右结合”。据初步统计，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涉及约60个部门和团体的合作。任何重大改革，只有加强统筹协调，得到各相

关方面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理解和帮助，才能凝聚改革的力量，减少阻力，形成合力。三要做到“点面结合”。改革必然导致原有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先在点上取得突破，才能减少和消除阻力，控制可能存在的风险，留出后续完善的空间。凡是涉及面广的重大政策，应该在一些地区和学校先行先试，取得成功经验后，再由点及面推广。这样做可以减少改革成本，使改革收益最大化。四要做到“远近结合”。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教育领域的许多矛盾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原因也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要对各种问题和矛盾进行科学分析，既要进行长远谋划，又要明确近期任务。对于反映突出的问题，要优先列入改革日程，及早启动改革，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五要做到“软硬结合”。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党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我们在硬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今后在继续加快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要更加重视软件建设，加强思想观念的更新、方式方法的转变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只有硬件软件同时建设、同步加强，才能提升教育发展水平。

三、扎扎实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为贯彻落实好教育规划纲要，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从今年年初开始，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就结合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研究确定了近期启动实施的重点任务，要求愿意先行先试的地区和学校，选择一项或几项申报国家改革试点，按照“自愿申报、专家评审、协商论证、综合平衡、统一部署”的原则，制定《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经过“三上三下”，总体方案不断完善，在全国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听取了与会代表的意见。大家认为，总体方案体现了注重顶层设计、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原则，说明中央对推进教育改革有长远考虑、决心很大、部署周密。8月25日下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已审议并原则通过总体方案，将在近期修改完善后印发各地各校。召开今天的会议，就是为了抓紧抓实抓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扎扎实实推进这项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基础工程、关系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切实加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领导，统筹制定试点方案，统筹推进试点实施，统筹督促检查，确保组织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为加强对全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法制办、国研室、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发展研究中心、自然科学基金会、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等20个部门组成，主要职责是审议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方针和政策措施，研究部署、指导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统筹协调教育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教育改革试点工作由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织领导，由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改革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二，加强方案设计。总体方案印发后，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要组织试点地区、单位和相关部门，深入调研，充分协商，科学论证，进一步细化、实化、具体化，形成试点实施方案。试点实施方案要突出针对性、操作性，聚焦体制机制创新，落实配套措施，制定支持政策，做好各种风险分析和应对预案，

明确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责任人。10月中旬前，地方试点实施方案由省级人民政府报领导小组，中央部委所属院校试点实施方案由主管部门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专家评审，并商有关部门同意后启动实施。对重大改革事项要报经领导小组同意。

第三，加强过程指导。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任务，是荣誉，更是责任。试点地区和学校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把推进改革试点作为重要工作职责，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落实改革措施，完善工作制度，定期督促检查，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要密切关注改革进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既要善于总结成功经验，形成政策措施，在全国推广；又要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将根据总体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和补充。对那些措施不实、保障不力、群众不满的试点，经过评估检查要及时调整。为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指导，国家将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组织各方面各领域的高层次专家，论证评估改革方案，检查指导改革试点。各地也要结合实际，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发挥好专家和社会各界的重要作用。

第四，加强宣传引导。教育体制改革，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坚定改革信心。要认真总结各地各校成功经验，组织交流，积极推广，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多做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的工作，多做增进共识、统一思想的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教育改革的良好氛围。

贯彻落实全国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各地各校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进一步学习贯彻的措施，组织集中学习，真正地把各项任务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今年教师节的各项活动，要以学习贯彻全国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为主题。要认真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任务分工方案，明确贯彻落实的思路、重点任务和配套政策。要以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重点，尽快确立和启动一批重大发展项目。要切实研究增加教育投入的政策和办法，不断拓宽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要抓紧制定好各省（区、市）教育规划和分领域教育规划，使之对国家教育规划形成有力支撑。

全国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翻开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篇章。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深化教育改革，是全党全社会特别是教育战线的重大任务。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协作，锐意进取，努力开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¹

九所顶尖大学校长探讨：中国模式能圆世界一流大学梦吗

国内9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10月10日至12日齐聚复旦大学，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友间的叙旧，他们更为一项重大的使命而来。在民众普遍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校长们此次探讨一个雄心勃勃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这9所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

¹ 《中国教育报》2010年9月16日第1版

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它们是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的大学，也因此结盟，在2009年组成号称C9的“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欢迎辞中道出了它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舍我其谁的自信与担当，他说：“以这9所高校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肩负着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引领社会发展、担当国家重任的优秀青年。”

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受邀为会议做报告，他谈到了自己“对过去10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到了可以更好地把握规律的时候，到了形成自己特色的时候，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尽管，他认为，我们的大学在学术领军人物、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他还是乐观地判断：“通过中国模式的发展，我们现在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的较好基础。”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忍不住向郭主任提问：世界一流大学看起来有多种标准，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郭新立的回答让人听起来觉得有点勉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体现中国的元素，打下中国的烙印，你说这是不是中国模式？”他说，“我认为从中国的发展出发就是中国模式”。

接下来几位谈到中国模式的大学校长，都没能对它作出清晰的界定或具体的设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此寄予厚望，并高调以类似于口号的形式提出。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他的最近一篇文章中对中国模式作了大致的限定：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如果以此来衡量中国大学的办学之道，我们又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有人认为，大学校长们的中国模式论其实反映了他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急切心情和试图告别生活在西方阴影下的想法。杨玉良校长就希望中国一流大学能有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他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长期处于学习、模仿、追随西方的状态表示不满。“如果我们不摆脱这种外部价值观的统治，发展中国的大学，就很难改变其依附和从属的地位，而站在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杨玉良忧虑地说，如此一来，建设一流大学就是空话，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关起门来自我安慰性的东西。

在这位校长看来，突破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走出中国特色的新路。他充满激情地说：“中国的大学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大学，应该独立自主于西方设立的规范和限制，应该是坚守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而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舌之鹦鹉。”因此，他认为，对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来讲，除了要争取世界各国大学成功的两大要素：大学自治和学术思想的独立自由，还要加上“我们自己大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

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列举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共性，如若干学科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教师队伍中拥有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大师，具有优良的大学精神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同时每所一流大学都为本国本民族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说：“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时代，没有超越国界的大学，他们对人类的贡献，首先在于对所在国家实现现代化或者保持强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首先必须赢得国内的普遍认同，仅从这一点来看，它们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

用奥运精神真能办好中国大学吗

据袁驷副校长了解，不管是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还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它们能够领袖群伦，都是以本国整体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为基础。“要真正形成中国模式绝不是由中国某个大学的单个形式出现，绝不应该是一花独放，而应该是群体的方式出现。”他说，“因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在当前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而模式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并有效地实施，再有一些成效那就是模式。”

C9联盟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其确定的一大目标就是要“联合共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眼里，这不是大话和空话，“只要剖析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案例——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就可以相信我们是能成功的”。

但陈骏反思说，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中国大学建设发展的条件、资金显然都大大超过当年的西南联大，但今天的中国大学仍然难以超越当年西南联大的地位和影响力，其差距究竟何在？他认为最根本的差距在于，西南联大有支撑着整个大学师生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而现在的大学却缺乏这一点。

他由此指出中国一流大学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由之路：在当今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必须倡导和践行返璞归真的大学文化，才有可能展现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和文化精神，才能与其声誉和社会期望相适应，并让世人受到鼓舞，感到希望，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风气，也才有可能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展现中国大学联盟的整体实力。

这位相信精神力量的大学校长甚至认为，如果能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奥运精神”和“世博会精神”迁移到“C9联盟”文化精神的创建之中，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就没有攻不破的难关。

只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对于一些同仁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作出了冷静的思考，他在会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把一种模式作为引领中国大学发展的趋势，这是错误的。他建议大家不要把中国模式的发展作为关注的中心。“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按教育规律办学。”郑校长说，舍此无他途。

由于国情和体制不同，完全照搬西方大学的发展模式在中国显然行不通。郑南宁说，世界一流大学是有标准的，但各国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密歇根大学是美国公立大学的典范，陈骏在谈到来自美国大学的启示时，

引用了该校前校长杜德斯达特一段话。他说：“我屡屡被人问到与‘密歇根模式’或‘密歇根秘诀’有关的问题……这所大学对多样性的追求非同一般的坚定与成功；它集公立和私立大学二者之长的混合型筹款模式；它免受政府干涉的强大自治；让密歇根大学有能力去创新，去冒险地对质量、规模和能力这三者非比寻常的结合……密歇根大学把各种特征巧妙结合在了一起，努力服务于一个处于变革中的世界。”

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和中国几乎处于同一个时代，它以1877年东京大学的建立为标志。但日本在学习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同时，在短期内就具备了与西方大学并驾齐驱的高等教育实力，至今，日本的国立大学已经产生18位诺贝尔奖得主。郑南宁校长在会上分享了他考察日本高等教育的体会，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办学之道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据郑南宁介绍，10多年来，日本国立大学都是文部科学省管辖的一级行政组织，它的校长由政府任命。在法人化改革前，国立大学的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但政府提供充足的办学经费，并不干预校内的学术活动。他说，这种完全中央集权似的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大学的“学术群体”在一个规范、清晰的管理下进行，大学自身只需要专心致志做好教育教学和教育研究等工作，而不用担心经费问题。

2004年4月，日本国立大学正式启动了法人化改革，不再作为政府直接管理的行政组织一部分，成为独立自主运营的法人实体，政府与大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即管办分离。郑南宁说，这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几点启示：一是立法先行，以法律和制度建设逐步推进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在法律的形式下确定政府和大学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并予以保障；二是充分发挥拨款机制的作用，在保证非竞争性拨款的同时，引入有导向性的拨款，实现政府对大学的间接管理；三是在大学内部一定要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确保学术自由。²

北航首次赴海外招聘骨干教师到“千人计划”各级人才

9月12日至21日，为加快建设空天信融合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以徐惠彬副校长为团长，材料学院宫声凯院长、自动化学院焦宗夏院长、能源与动力学院丁水汀院长、机械学院王田苗院长、宇航学院蔡国飙院长以及人事处李军锋处长参加的北航海外招聘团赶赴英国、德国招聘海外人才，并应英国巴斯大学和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邀请，对两所大学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次组织专程赴海外招聘活动，招聘岗位的范围包括从骨干教师到“千人计划”人选各个层次，涵盖了材料、化学、环境、电子信息、光电、计算机、航空宇航、机械、核物理、管理、金融等北航所有主干学科。

招聘团在英国伦敦、爱丁堡和德国柏林、慕尼黑四个中国留学生相对集中的城市各举办了一次专场招聘会，在旅居英、德两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得到了热烈响应。北航招聘团所展现出来的务实精神和求才若渴的诚挚情意感染了参加活动的来宾，四场招聘会共有一百二十多位青年学者与招聘团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洽谈，当场共收到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

² 《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14日

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的求职简历八十多份，与十多位优秀青年学者现场签署了聘用意向书。返校后，相关学院还陆续收到来自这些学校的简历，学校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将简历分类推荐给相关学院，2个月内会将结果正式通知到每位应聘者。

在招聘会后，参会的留学生“没想到北航这次竟然现场招聘，居然可以现场谈完就签意向聘用书”。也有驻当地的使领馆工作人员向招聘团成员反映，一些未能参加现场招聘会的留学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为错过这样宝贵的机会遗憾不已，还有学者在错过本地招聘会后，自己坐火车赶到下一会场参加招聘交流活动。

在英、德期间，招聘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部分旅英、旅德校友进行了亲切会见。徐副校长强调，校友资源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是支持学校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北航的发展离不开广大校友的支持和参与，欢迎大家有机会常回母校看看，以不同的方式亲身参与并见证北航建设空天信融合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事业的发展过程。徐副校长同时就关于在英国、德国成立北航校友会的事项与各位校友进行了沟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并表示尽快联络相关人员，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友总会牵头，开展各项筹备事宜。³

天津工大 91 个科研项目“海选”本科生

10月11日，天津工业大学启动本科生科研项目招募计划，全校15个学院的91个科研项目打开大门，提供了近600个参与科研和实践的岗位。

这是该校为期3个月的“专业开放日”活动之一，活动还包括举办55场专题讲座，开放77个特色实验室。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本科生科研项目招募计划。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学生毕东决定报名“扩音电话机的设计”项目，他说：“没想到本科生也有机会参与科研项目研究，我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努力锻炼自己。”

根据《天津工业大学本科生课外实践活动的学分管理办法》，经选拔参加本科生科研项目招募计划的同学，可获得相应实践学分的奖励。

当天，天津工大生物化工研究所所长吕晓龙教授选了5个科研项目对本科生开放。他说，像其他工作人员一样，被选中的本科生会直接参与项目的全过程。希望他们通过参与研究，增强动手能力，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了解本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和科研动态。而管理学院教授阎耀军招募本科生并不拘泥于学院和专业，他提出的条件是：热爱科研工作，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熟练掌握计算机相关知识。⁴

³ 科学网 2010年10月7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0/238432.shtm?id=238432>

⁴ 科学网 2010年10月11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0/238662.shtm?id=238662>

吉大数千名新生成为“名师班主任计划”首批受益者

今年刚上学的吉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同学惊讶地发现，中科院院士宋玉泉竟是自己的班主任。和他一样，数千名新生成为“吉林大学名师班主任计划”的首批受益者。

金秋时节，“吉林大学名师班主任计划”正式启动。“今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一个热词是育人为本，这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二十字指导方针中的核心。今年也是吉大的关注学生成长年，如何让育人为本和关注学生成为制度？为此，我们确定了名师班主任计划。”吉林大学校长展涛介绍说，把担任班主任明确为名师的职责，哪位教授的“层次高”、“影响大”，哪位就要优先承担这份责任。

“名师计划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学校教务处有关人士介绍说，一是名师班主任都是“志愿者”，学校不予发放报酬。通过名师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风范来感染和教育学生，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进行指导。二是名师班主任“德行学问”全负责。学校要求名师班主任的工作重在指导和交流，要经常深入到学生当中，定期与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的沟通和交流，原则上每两周集中交流一次，既要重点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又要负责对学生进行学业指导。三是名师班主任考核学生说了算。学校规定学院负责每年对班主任工作做年度考核，以所在班级学生考核意见为主，学生成为评价的主体。

目前，学校39个学院分别举行了“名师班主任计划”暨“本科生教授导师制”启动仪式，369名名教师担任新生班主任，其中博士生导师、教授比例占80%以上，更有院士、资深教授、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唐敖庆特聘教授”担任此项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宋玉泉、滕吉文，我国著名法学家张文显就是首批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和法学院的名师班主任。

● 国际观察

拥有四位诺奖得主的芝加哥大学如何诠释“一流”

大学是科学研究重镇，也是众多荣膺诺贝尔奖的科学研究成果诞生的摇篮。在我们不断追问何时问鼎这一科学桂冠的时候，不妨换一种思路，去看一看诺贝尔奖获得者工作和学习的地方是什么样的，那里有什么能帮助他们走向成功。

诺贝尔奖得主眼中的一流大学

“什么样的工作和学习环境能造就如此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对你取得成功有着怎样的影响？”

近日，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正式落户北京文化大厦20层，四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亲临助阵，结合亲身经历就高水平大学建设、创新人才培养

以及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等中美高等教育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发表演讲，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他们是198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詹姆斯·克罗宁，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里·贝克尔，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赫克曼和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杰·梅尔森，他们也是从芝加哥大学走出的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一分子。

你在这里学习的唯一原因是你喜欢物理学

“你在这里学习的唯一原因是你喜欢物理学”，79岁的詹姆斯·克罗宁教授谈起芝加哥大学对自己人生的影响时，仍然充满着向往的神情。“当我走进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发现周围的同学和老师对物理学都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如果不是这样的环境，我可能也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克罗宁于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0年因发现物质和反物质的不同自然规律荣获诺贝尔奖。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科学的真谛不是追求诺贝尔奖或其他荣誉，而是发现大自然界的奥秘，不断探索未知的世界。

对于当今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及面临的挑战，克罗宁说：“现在人们不太重视基础科学，认为这些东西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但是要知道，许多改变我们生活的技术都是从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中发展出来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社会学专家加里·贝克尔指出：“现在，一些大学和学生面临着功利化的挑战，以至于抄袭、造假等问题时有发生。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新技术令它变得更容易。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这些问题，也有很多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教师要与学生多接触，不仅关注他的学习结果，还要关注他的学习过程。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学生平时表现不怎么好，但是期末论文却写得十分出色，那么教师就应该引起注意了。”

“要知道，大学的学习并不只是获得高分这么简单，我们不仅关注学生当下的学习成绩，也关注其今后整个职业生涯。我曾经警告我的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学者，以个人信誉换取好分数的做法得不偿失。我的学生都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尤其不想被梅尔森先生给出‘曾经靠不诚实的手段完成学业’这样的评语。”罗杰·梅尔森如是说。

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学生成就了最好的大学

在谈起芝加哥大学的成功之道时，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答案近乎一致，那就是最好的教师和最好的学生。

但是最好的教师和最好的学生从何而来呢？如果加以注意，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芝加哥大学并不是靠重金去聘请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来校任职，而是这些学者在获得这项桂冠时已经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四位学者中在校任教时间最长的贝克尔这样解释这一问题：“大学要想获得持续不断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发现和培养有潜力的青年教师，第二是挑选优秀的学生。”贝克尔深谙“教学相长”之道。在他看来，发现并培养有潜力的年轻教师，是现任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优秀的学生不是单向地从教师那里汲取知识，也可以使教师受到启发。或许这就是芝加

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扎堆”的秘诀。贝克尔自己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学生，师生二人均获得诺贝尔奖，实属佳话。

“当然，现在要挑选优秀的学生和教师并不容易。在高等院校面向全球的时代，各校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贝克尔说。

芝加哥大学有句名言，“明辨之路是争论而非顺从”。詹姆斯·赫克曼用行动向现场的所有人作出了诠释：“你们说的很重要，但是我也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拜访过许多大学，我发现其实拥有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的大学并不少，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特点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活力。这种活力来自于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无处不在的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即使在这样与学术无关的场合，赫克曼也追求独到的见解，而他的观点令渴望“成功秘诀”的人们频频点头。赫克曼说：“我们将芝加哥大学称为‘智力密集’的地方，它非常讲究互动和集体协作。你在这里可以经常看到一群人在很严肃地讨论某个问题，这样一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意思。”

贝克尔认为，竞争和协作是一种并存的关系。他举例说，美国其实只有 25% 的大学是私立的，75% 的大学是公立的，但正是因为两类大学的竞争，才能持续不断地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当然，这种竞争与协作并存的关系不仅存在于学校内部，也面向全球。近年来，芝加哥大学先后在法国、英国、新加坡开设中心或校区。克罗宁说：“在大型科研合作项目上，中国已经成为非常好的合作伙伴。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的成立，将为我们加强和中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合作提供很好的平台。”⁵

相关内容：

2010 年诺贝尔奖部分奖项获得者

-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英国生理学家、“试管婴儿之父”罗伯特·爱德华兹，在体外授精技术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
- 诺贝尔物理学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在“研究二维材料石墨烯的开创性实验”中作出卓越贡献。
- 诺贝尔化学奖：由美国科学家理查德·赫克和两名日本科学家根岸英一、铃木章分享，他们在“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 诺贝尔文学奖：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⁵ 《中国教育报》2010 年 10 月 12 日 第 3 版

良莠不齐的中外合作办学谁监管 上海开始试点

国际认证机构图谋“瓜分”中国教育 良莠不齐的中外合作办学谁来监管

“30多家国外的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到中国来开会，讨论的主题是基础教育谁去管，职业教育谁去管，高等教育又是谁去管，这个事情应该引起重视。现在这些国际教育认证机构、质量保障机构正在‘瓜分’世界，有点教育质量殖民主义味道。”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江波的这番话确实引起了参会者的关注。

在近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中心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中外办学机构代表等各方人士聚集一起，讨论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以及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工作情况。

近几年，中外合作办学风起云涌，据报道，目前我国境内共有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1200多个。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外方合作学校多是规模小、名气不大的学校，甚至还有一些不被所在国社会、专业认证机构认可的“文凭工厂”，影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声誉。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国外有益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加快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是国家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原始初衷，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针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证体系和机构，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最直接的影响是家长和学生在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时，面对名目繁多的项目，既没有选择依据也无法比较优劣。

“现在国际化的进程在整个高等学校当中推进得特别快，各国都在考虑国际合作和交流，我国面临的问题很多。”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路江在座谈会上，谈到自己所在学校在中外合作办学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审批、学历认可等，“中外合作办学现在是多头管理，缺少专门机构管理。”

中国巨大的教育需求和政策监管上的空白点，为国际上的一些质量保障机构提供了市场。据有关部门调研，目前国际上的质量保障机构纷纷进入中国，因为按照他们各自国家的法律规定，他们在海外办学要去认证评估。

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专门提及，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并明确提出，要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

座谈会上，与会者普遍提到了目前中外合作办学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有些中外合作教育项目，外方既不是一个教育机构，也谈不上优质资源，甚至有的是借机乱收费、骗钱。对于这些乱象，江波认为这是监管出了问题，一方面我们鼓励、支持、引进优质资源不够，另一方面说明规范管理不到位。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统筹考虑，提出意见、对策，目的是有利于我们学生的培养，有利于中国特色的教育对外开放体系的建立，也有利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和

发展。”因此，江波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应该有一个质量监管标准，以做到认定优质资源，该支持的支持，该制止的制止。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应该吸收国际上有关国家教育质量保障标准的优点，但是同时也要以我方为主，和对方进行技术上的磋商，必须维护我国的教育主权，不能允许外方单独认可在中国本土办的学校或者是项目。

有关人士也认为，对中外合作办学整个质量保障体系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组织保障。这种保障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需要有一个机构专门来做这个事情。较好的选择是由行业组织出面，使其既成为一个桥梁和纽带，同时又是政府的配角和助手。一方面它可以按照政府的政策开展工作，另外一方面可以发挥行业自律。

讨论中，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尽快建立一套自己的中外合作办学认证体系。但是一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负责人，对其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存疑虑。首都经贸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傅磊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搞评议也好，认证也好，是要干什么？是想认定哪些学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资质，还是我们给外方提供学校的好坏标准？另外，这种认证是民间还是官方，也有待商榷。”

其实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证，在上海已经开始试点。20世纪90年代，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在上海出现以后，教育部门就发现有这些项目的质量如何保障，用什么样的办法来保障等问题。

经过探索，上海率先建立了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委员会，采取了行业自律的办法，由政府委托授权，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认证。目前试点认证了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上海市法语培训中心、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昆士兰学院，以及上海金融学院中丹合作办学项目等。

“在欧洲，已经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等很多国家建立了教育认证机构，而且这些教育认证机构也都联合起来成立了国际组织。并且，世界银行、世界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就认识到了这种趋势，他们有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教育认证机构开展国际上的合作，以推广教育质量保障的办法。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试点进行认证活动也是符合这种国际趋势和潮流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学术交流部副主任卜焕芳搜集了大量国外认证机构的有关资料，她认为，中国将建立的认证体系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行业行为，二是自愿认证。

对于认证与目前教育部门开展的以本科院校为主的评估的区别，上海教育评估院副研究员俎媛媛进行了分析。她认为首先二者目的不同，认证的内容是过程管理，目的是为了改进和提高。这从根本上有别于以分等、分级的评估。另外，评估的标准一般是统一的，缺少弹性和灵活性。而认证评估的不是结果，评的是办学的思路和发展规划，评的是办学者的教育功能发挥是不是到位。认证结果是一种描述性的表达，不像评估结果是量化的表达。认证还将给办学者的提出建设性的、可改进的意见，以及相应的支持和服务。⁶

⁶《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11日

办学质量影响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洋为中用

目前,我国中外合作项目达1000多个,办学质量影响其生存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洋为中用”

卡地亚、渣打银行、黛安芬等22家国际知名企业,日前与东华大学莱佛士国际设计专修学院合作。快速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让中国学子不出国门就能接受国际化教育。

“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的中外合作机构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教育规划纲要对中外合作办学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外合作办学迎来重要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10年发展合作项目千余个

毕业于某财经学校的小李因对工作状态不满意,准备选择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继续深造。最终,他选择了一个中英合办的经济类硕士就读。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不仅成为很多高考成绩不理想的考生和学生家长的首选,也深受一些对现实工作不满意、希望继续深造的毕业生的青睐。

目前,我国境内共有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1000多个,中外合作办学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覆盖除西藏、青海和新疆以外的26个省份。其中,有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为代表的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模式,也有以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等为代表的中外合作二级学院的模式。

就学历层次来说,现有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本科项目为主,硕士学位项目次之,博士学位项目较少。在学位授予上,本科项目既有授予中方学位的,也有授予外方学位的,硕士和博士项目以外方学校单独授予学位为主。教学模式有“3+1”、“2+2”、“1+2+1”等。

从办学模式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校校合作,即由外方提供办学的课程设置、专业课和语言课教材及证书,外方派遣或招聘部分或全部专业和语言课教师,中方提供办学人员、场所、日常管理、基础课师资;二是学校与公司、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

据了解,高教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境外优质专业、课程、师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吸收了一定数量的社会资金和境外投资,引进了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和专业,也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内容。

出国前景不明是“软肋”

学生李力高考成绩不理想,在参加了某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国内3年的学习后,因语言成绩不过关,无法赴国外继续学习并获取学位。面对3年的时间投入与10多万元的学费支出,李力懊悔不已。而像李力这样的学生并非少数。

公众反映的有关高教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问题多与此有关,包括引进的教育资源优劣并存,外聘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招生管理不完善,合作办学机构条件差,

办学质量不高等。学生认为，高额学费交得不值，一些家长反映，学生出国继续学习没有保证。

中外合作办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种办学起初是和普通类招生分离的，因此对家庭经济条件好、对普通类招生无把握的考生来说，增加了既能进入名牌大学读书、又有机会出国深造的选择机会。

2007年，教育部规定中外合作办学与普通专业纳入同批次招生，中外合作办学招生情况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一些办学规范、声望良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门槛提高，更受追捧。相比之下，一些盲目上马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则招生困难。同时，一年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不等的高额学费，也让许多学生望而却步。

某高校中德合作办学项目称，如果学生语言过关，可以到德国大学就读。但实际情况却是，一次通过相关语言考试的学生不足1/5。对此，莱佛士教育集团中国区总裁周国础表示，高质量的外教及外语授课非常重要。

出国前景不明朗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一个“软肋”，由于一些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针对出国的培训不够完善，导致学生的出国率不高，就业前景不确定，难以让家长放心。

从跨国教育的经验看，质量是否有保证，关系到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的生死存亡。

国外资源可能“水土不服”

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培养国际化人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国际合作不应该是简单的西化，而应当结合国情有选择地吸收国外优良的教育模式和体制。

16年前，新加坡莱佛士教育集团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所中外合作学院—东华大学莱佛士国际设计专修学院，成为首批获得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之一。如今，作为跨国专业教育机构，莱佛士教育集团除了在亚太地区14个国家35个城市创建国际学院外，还与中国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的高校开展了合作。

谈到合作办学的体会，周国础表示，教育的品牌化、集团化有着积极意义。品牌化和集团化发展是中国教育做大做强并与国际接轨的必要过程。让周国础欣慰的是，东华莱佛士学生成为上海世博会最年轻的服装设计团队、北服莱佛士学生成为世界小姐北京赛区总决赛晚礼服的设计者。

“全英文教学，教材由英方引进，教师由英方选派，质量评估由英国诺丁汉大学把关，最后颁发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文凭。”谈起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诞生与发展，校长杨福家表示，“教育不是做生意，教育是一个使命，一流大学要对学生有责任感。”他希望从宁波诺丁汉大学出来的学生有素养、有理想、有探究精神。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看来，学校的大楼和名师固然喜人，但让他最引以为豪的则是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高瞻远瞩，承诺不从这所学校拿走一分钱的利润，并决定将西交利物浦大学建成研究导向型国际大学。“也许过了100年再回首，会发现这个决定是影响这所学校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席酉民说。

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质教育资源不仅指一流大学，还可以是国外学校的特色专业与优质课程，引进的目的是“为我所用”。同时，引进的优质教育资源，还应当与中方合作学校或学科、专业互相匹配、优势互补，并在办学实践中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断加以本土化。否则，引进的优质资源也可能“水土不服”。⁷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留学中国计划》

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的“行动指南”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解读《留学中国计划》

今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教育规划纲要还指出，“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实施留学中国计划”。

为深入贯彻和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适应国内外发展新形势，在9月28日召开的全国来华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公布了《留学中国计划》。对于该计划中大家广泛关心的一些问题，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给予了回答。

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客观需要

问：在过去60年来华留学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我国为何还要启动《留学中国计划》？这个计划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答：当前之所以要启动《留学中国计划》，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迫切需要。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留学中国计划》，作为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工作在我国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推动教育国际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培育我国软实力、宣传和谐世界理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推进来华留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保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规模逐年扩大。过去5年，来华留学生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7%，年均净增人数约3万人。按照计划，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就读的来华留学生规模将扩大到50万人次，其中学历留学生达到15万人，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和政策。出台《留学中国计划》，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断推动来华留学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计划”将进一步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

问：我们注意到，《留学中国计划》提出了“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十六字工作方针。这是否意味着优化结构是今后10年我国来华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⁷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0年10月8日

http://world.jyb.cn/gjgc/201010/t20101008_392047.html

答：应当说，扩大规模是未来 10 年我国来华留学工作的首要任务，优化结构是迫切要求，保证质量是发展关键，规范管理是重要保证。今后 10 年，来华留学工作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统筹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推进来华留学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造中国教育的国际品牌。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我国来华留学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来华留学规模稳步扩大，来华留学生生源国家和地区数不断增加，层次越来越高，专业选择也趋于多样化。但是，今后来华留学生的生源结构及专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仍是我国来华留学生学历生的主要来源国。2009 年，来自亚洲的留学生人数居首位，约 16.16 万人，占全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67.84%。在目前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文学、医学、经济、管理、工学、法学、教育、理学等 11 个学科中，文科（含汉语）和医科仍是留学生就读的主要专业领域。

问：当前，来华留学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也成为教育外事工作新的增长点。在《留学中国计划》实施过程中，将有什么样的机制确保来华留学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答：来华留学工作需要外交、公安、财政、物价、卫生防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密切配合，更需要有人与我们一起统筹规划，打出先手牌，既有短期战斗，又有长期规模战役。为此，我们将建立来华留学部际协调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前者以行政部门为主，后者以专家学者为主，形成领导有力、分工协作、共谋发展的来华留学工作格局。

多项措施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问：我们注意到，新公布的《留学中国计划》被称为是指导我国未来 10 年来华留学工作的“规划纲要”和“行动指南”。未来 10 年，我们将有哪些措施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答：“计划”提出，到 2020 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的来华留学工作与服务体系；造就出一大批来华留学教育的高水平师资；形成来华留学教育特色鲜明的大学群和高水平学科群；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这也是未来 10 年我国来华留学工作的发展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今后 10 年，我们的来华留学工作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着力推进来华留学教育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学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创新来华留学教育培养模式，鼓励来华留学教育机构积极探索，进行学历教育弹性学制试点”。

当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将是我们的工作重心。具体措施上，我们在招生录取、品牌专业课程建设、“双语”师资队伍建设和奖学金体系建设、学校来华留学工作的质量评估体系构建和来华留学人员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以保证来华留学生在华都能接受高质量教育。

历经 60 次修改，征求意见超过 500 人次

问：这份用于指导未来 10 年中国来华留学工作的《留学中国计划》，其诞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答：可以说，这份留学中国计划，是很多人智慧的结晶，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整个制定工作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在计划制定之前，我们深入调研，开展战略研究。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各自组织研究小组，研究来华留学在我国教育外事工作中的定位，研究来华留学的发展轨迹，研究来华留学工作与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水平的关系。同时，我们还请20多个我国主要驻外使馆教育处（组）报回驻在国的国际学生发展规划，如日本的30万人计划，韩国的10万人计划等，形成了近10万字的调研报告。

二是起草文本，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咨询论证。从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我们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积极参与起草修改工作，文本初稿形成后，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主持召开了《留学中国计划》修改专题办公会，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召开了三次修改讨论会，征求了有关司局、直属单位、32个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和5个计划单列市教育局、75所部属高校、59个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和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欧盟使团的负责人，以及100多位从事来华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意见。

从初稿，到最终公布，这份《留学中国计划》累计进行了近60次修改，征求意见超过500人次。

附件：

留学中国计划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来华留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特制定本计划。

一、发展目标

到2020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的来华留学工作与服务体系；造就出一大批来华留学教育的高水平师资；形成来华留学教育特色鲜明的大学群和高水平学科群；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

二、主要任务

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50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15万人，根据国家战略和发展需要，逐步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来华留学人员生源国别和层次类别更加均衡合理。

三、指导思想

统筹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推进来华留学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造中国教育的国际品牌。

四、工作方针

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

五、发展思路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着力推进来华留学教育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学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投入力度,分省市制定发展规划,分类指导。完善来华留学的服务机制与监管体制,鼓励具备条件的学校、科研机构及其他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依法开展和参与来华留学教育。

六、政策保障

不断完善来华留学政策、法规、制度。明确政府、来华留学教育机构和留学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保证来华留学工作依法、科学、规范,营造来华留学工作良好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七、管理体制

教育部负责来华留学工作的宏观管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属地化原则负责本地区来华留学管理工作。来华留学教育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负责本机构内来华留学人员的日常管理和服务。

八、工作机制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是本地区来华留学的主管部门,协调同级外事、公安、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等部门,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形成政府各部门和来华留学教育机构之间权责明确、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保障有力的管理工作机制。

九、宣传推介

大力加强来华留学宣传和推介力度。整合国内国外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国内有关机构和驻外使(领)馆、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在来华留学宣传方面的作用。加强“留学中国网”及各来华留学教育机构外文网站建设。

十、招生录取

改革来华留学人员招生录取办法,采取国际通行的审核、考查、考试等相结合的灵活招生方式。在完善预科教育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来华留学人员进入本科专业学习标准。严格新生学籍及学历电子注册制度。

十一、培养模式

不断创新来华留学教育培养模式。鼓励来华留学教育机构积极探索,进行学历教育弹性学制试点,以多种形式将来华留学教育延伸到国外。研究开展来华留学网络教育和远程培训的可行性。

十二、专业课程

打造品牌专业,优化专业结构,建设对来华留学人员更有吸引力的专业课程体系。支持高等学校着力打造汉语授课品牌专业,开设一定数量的英语授课学位课程,重点支持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优势的学位课程,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十三、师资建设

加强来华留学师资队伍队伍建设。结合高等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教师外语教学等方面的能力培训，完善来华留学教师业绩评价办法，使一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精通教学、关爱学生的优秀教师成为来华留学教育的骨干力量。

十四、质量保障

构建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加强对来华留学教育条件、培养质量和管理服务水平的评估，促进学校合理定位、增强来华留学工作办学特色。逐步确定一批来华留学教育示范基地。

十五、教育管理

积极推动来华留学人员与我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趋同化，加强中国法律法规、优秀传统文化和国情教育，帮助来华留学人员客观了解中国社会发展情况。

十六、管理队伍

完善来华留学管理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加强培训机制建设，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爱岗敬业、熟悉外事、精于管理的留学人员管理工作队伍。

十七、生活服务

改善来华留学人员的后勤生活保障制度，不断优化来华留学环境，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积极为来华留学人员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完善来华留学人员医疗保险体系。

十八、社会实践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来华留学人员勤工助学提供便利，为实习实践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教学与实习对接、课堂与社会衔接的教育机制。

十九、奖学金体系建设

保证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规模稳定增加，逐步推行奖学金各项内容货币化改革。鼓励并支持地方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自然人设立各类来华留学奖学金。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奖学金体系。

二十、毕业生联系工作

加强与来华留学毕业生的联系。依托相关直属单位开展来华留学毕业生工作，视工作发展需要申请设立专门机构。鼓励并支持来华留学毕业生成立海外校友会。⁸

⁸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0年9月30日

http://www.jyb.cn/world/cg1x/201009/t20100930_391450.html

● 专家论教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推进开放办学战略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多次出现“开放办学”的相关论述,为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明示了方向。但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关于开放办学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人关注国际交流,有人强调产、学、研结合,有人呼吁学校与政府的合作,还有人倡导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不一而足。然而,上述种种观点所表达的只是开放办学的现行途径或可能的形式,而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日趋全球化,高等教育日趋国际化的新形势下,我们需要结合《纲要》精神,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一体化的框架下,系统地、全面地把握开放办学的内涵,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办学实践。

一、开放办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现代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具备三大功能:第一,作为培养与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教学机构,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让他们养成终生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习惯,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第二,作为生产、传承各种知识、理论和观念的学术机构,让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能够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第三,作为服务国家宏大目标和促进区域发展的社会机构,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大学的发展史,正是上述三大功能不断完善的历史,也是大学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漫长历程。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1862年《莫里尔法》的颁布及1912年“威斯康星思想”的正式诞生,标志着以往“自由探索”型的大学功能观终被突破。社会发展和变革要求大学走出围墙,放弃过去那种自我封闭、孤芳自赏、远离社会,只求学术声誉的状况,希望它们能够将自身的发展与外在的社会变革紧密联系起来。从此,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大学也因此走出了“象牙塔”,开始步入了开放办学的时代。

一方面,高校的开放办学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世界各国追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各种各样的难题,诸如经济如何转型、社会矛盾如何解决、环境问题如何处理,考验着政府和社会管理者的智慧,因此需要大学积极介入,通过提供专业性咨询,帮助解决上述各种问题。于是,大学成了高精尖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基地,成了政府的智囊、企业的信息库、技术库和人才库,高校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课题组、技术攻关小组和社会问题研究组织等。如新中国成立60年来,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始终紧随国家战略、经济建设和时代要求,成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引领力量。

另一方面,高校的开放办学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学只有坚持和扩大对社会的开放,才能及时地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通过吐故纳新,优化其原有的知识体系;才能开阔师生的视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将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人才需求真正契合起来;才能充分地利用校内和校外的各种办学资源,增强大学自身的“造血”功能,更好地为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服务。特别是在高等教

育市场化环境下，一旦失去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强大的经费支持，大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将一筹莫展。

因此，任何社会的大学教育都不可能脱离所在国家和区域社会的需要而独立地、盲目地发展，这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中尤其如此。大学需要充分发挥自己所具有的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同整个国家的发展相协调、相统一，在服务区域社会中更快地向前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已经成为一个与政府、社会、企业互相渗透、共同合作的开放型组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的开放办学又出现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大学不仅在其所在国家内与政府、社会形成合作关系，而且随着新技术革命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它们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中展现其开放性的新面貌。国际合作与交流前所未有的频繁，交往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从简单的学术互访到召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从学分互认到实质性合作办学，等等。总而言之，“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学校的第四大功能，全球化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使高校的开放办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南京大学推进开放办学的改革实践

在推进开放办学的改革潮流中，南京大学积极探索，树立率先意识、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贡献意识，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围绕国家目标导向和地方经济需求，通过政、产、学、研合作，立足江苏，辐射全国，为创新型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可能的服务。同时，积极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开放的胸怀实现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愿景。

（一）校府合作

近年来，南京大学提出服务江苏、面向全国的发展战略，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开创性地建立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形成了政、产、学、研的长效机制，从自由探索型的研究向国家目标导向的研究转变。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充分释放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能量。

第一，实行创建科研技术中心和新技术孵化基地并重战略。根据学校的特色与发展定位，南京大学以注重基础、加强应用、发展边缘、促进联合为方针，以基础研究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应用研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致力于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指导思想。调整科研布局、加强科研组织，全力推动科研应用，实施将南京大学建成我国重要的科研技术中心和新技术孵化基地的并重战略。

第二，努力构建推进科技创新持续发展的机制，提升服务国家目标的能力。南京大学坚持面向国际前沿，瞄准国家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建立适应重大项目特点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具体而言，学校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学科交叉平台的组建和发展；通过强化科研团队组织建设，高质量地完成了国家重大专项、“973”、“863”、“支撑计划”等重大科研任务；以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为契机，实现了国家工程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零”的突破。近年来，学校还成立“国家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及“管理办公室”，制定完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通过机制创新，以统筹服务国家目标的各项工作。

第三，办学紧密联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与地方政府实现双赢。南京大学非常注重将学习实践活动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为此，南京大学成功举办了26期“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围绕影响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核心问题进行研讨，其中关于江苏沿海发展战略、创新型经济、昆山模式等政策建议已经成为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南京大学与南京、常州、无锡、苏州、镇江等市合作共建国家大学科技园和政、产、学、研平台18个，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领航、护航和助航，最终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创建现代城市的双赢局面。

（二）校企合作

南京大学通过与产业界建立起立交式的沟通桥梁，正在探索着一条行之有效加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合作模式。

第一，创新组织体系，形成产、学、研合作的运作机制。南京大学成立了以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服务地方工作领导小组，搭建了以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操作机构，相关部处协作、院系为支撑，校内外合作平台为实施机构的组织体系，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保障平台健康成长，实现产、学、研合作的可持续发展。该体系运作流畅，富有效率。2008年10月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成为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是江苏省高校的唯一，也是首批“985”重点建设的九所高校中唯一传统的综合性大学获此殊荣。

第二，多方携手，创新合作的运作模式。近年来，南京大学与金川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格林保尔光伏有限公司等诸多企业建立了产、学、研联合研发的模式，通过各展其才、优势互补，以推动校企合作的研发局面。而更为重要的运作模式则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中介作用。南京大学率先在江苏把合作平台建在各市的产业园区并注重与特色园区合作，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政府出财力和政策，南大出人才和智力的方式，共建政、产、学、研合作平台。

第三，放眼世界，建立国际化研发机构。在“985工程”的推动下，南京大学与大型跨国高技术在产、学、研领域的合作呈现出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和层次提升的良好局面，先后建起“南京大学—富士通软件技术中心”等联合开发机构。此外，与全球500强德国巴斯夫公司、摩托罗拉公司的合作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三）国际合作

南京大学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21世纪学术联盟、大学校长国际协会、世界大学联盟（WUN）等组织的成员，通过参与这些国际大学组织，南京大学不断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南京大学也通过招收外国留学生和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办学，践行国际化的理念。南京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包括：

学科的国际ization。为了提高学科的国际ization程度，南京大学与众多国外知名大学建立国际化办学机构，如“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中德法学研究所”等，开展相关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近来，又一批国际化合作机构借南京大学仙林国际化校区建立之际成立，如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合办的中加学

院等。按照学校的计划，仙林国际化校区将构建涵盖 50 门课、对所有学生开放的国际化课程体系，以进一步提升南京大学国际化办学的深度与广度。

学术的国际化。1984 年，时任校长的曲钦岳院士提出学术视野国际化的独特战略，有力地把南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带向国际。据统计，1992 年以来，南京大学被国际权威的科研检索资料《科学引文索引》(SCI) 收录的论文数连续 7 年位居中国大陆高校首位，被引用论文数也连续 8 年位居中国大陆高校第一。

学者的国际化。随着“985 工程”中“聘请世界著名学者”项目的启动，南大聘请的外国专家人数逐年增长，层次也不断提高，先后邀请了杨振宁、丁肇中、阿尔费罗夫、艾伦·斯宾塞·莱思、芒德尔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大批世界著名科学家与广大师生进行面对面交流。此外，学校还于 2003 年在国内率先面向全球招聘教授、副教授，以实现学者的国际化。在“请进来”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华英文教基金及各种国家、省级及学校的奖教基金渠道，每年选派一批优秀青年教师到国外一流大学交流、学习，力求培养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团队。

学生国际化。南京大学主要通过三大措施实行学生国际化：坚持让学生参加在国内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参加在国外举办的学术会议；主动策划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活动项目。目前，学校通过运行 20 多个长期的学生交流项目，已有效地与 20 多所国外高校建立了长期的学生交流关系，其中每年向国外派送长期交流学生 200 多人次；同时，积极参加并主办国际学生交流活动，开拓学生国际视野，提高学生参与国际活动的的能力，让学生在各种国际学术、科技、体育大赛中一层风采。

三、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开放办学的思考

开放办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多层面的概念。作为所在国管理系统之内的社会机构，大学的开放办学是其适应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能否以开放的姿态融入社会也成为评判大学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同时，作为创造与传承整个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文化机构，大学又有其超越国家界限的一面，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高校国际化更成为办学目标之一。事实上，融入到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中去，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是众多现代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的信念。

首先，进一步从校府合作、校企合作和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来提升学校开放办学的水平。然而，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整个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体系是在近代才从西方引进的，我们的管理文化与学术文化与国际学术界之间存在许多不一致性。它们将对我们越来越深入的开放办学的实践提出更大的挑战。从南京大学多年的办学经验来看，开放办学的复杂性显然不是上述三个层面的孤立的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如校府合作的焦点不仅涉及到产、学、研关系上，而且涉及到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的改革；产、学、研合作的深层次问题还关系到传统学科向新学科升级、跨学科合作、课程与教学模式的更新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问题；此外，产、学、研合作的领域一旦超越国家的界限，走上国际化道路，这些问题会更加突出、矛盾更加尖锐。因此，从战略管理的角度而言，大学需要树立系统化地规划开放办学的思路，统筹大学与政府、企业、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大力推动高校开放办学的同时,我们要坚守大学的基本使命和功能及其发挥的途径,注意避免简单地被动地适应社会。尽管在大学组织中可以出现政府、企业的科研组织;在政府、企业组织中出现大学教授和学者的身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发展知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相互促进的原则。1978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胡福明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成为中国“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催生了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事例表明,大学提供的社会服务必须是前瞻性的、引领性的、学术性的;要体现高等教育内涵,并通过特有的方式与途径来实现。背离这个前提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必定为大学应有的开放之道所不容。

最后,在关注大学适应外在环境的变迁而进行广泛合作的同时,应该注意使学校自身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大学内部拥有宽松有序的制度环境和调度自如的资产资源,它才能够更好地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才能更快地抓住各种发展机会,实现快速发展。近年来,为解决普遍存在的学科壁垒现象,南京大学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文献信息系统研究中心、材料科学研究中心等近103个跨学科研究机构,搭建了互通、互联的信息平台,互渗、交流的人才平台和互补、共享的设备平台。与此同时,南京大学于2009年开始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建设通识教育和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本科教学模式,让大学生充分享受到多元化、开放性的高等教育,从而促进学校内部教学、科研等工作与社会服务、开放办学一体化。

开放办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学校需要从观念、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多个层面完善管理体制,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证开放办学的规范性、系统性、连续性和有效性,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纲要》中提出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提高教育开放水平,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⁹

哈尔滨理工大学校长李大勇: 依托行业 立足地方 走特色发展之路

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变革,一批具有行业背景的高校先期调整合并,后期转制下放,哈尔滨理工大学即在其中。合校之初,学校规模明显扩大,学科专业得以加强和互补,新组建的大学在机电类学科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划转地方后,政府主导的行业联系不复存在,直接服务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校如何保护和发挥业已形成的学科优势,在新的体制下找准发展定位,培育新的办学特色,确保学校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大潮中抓住机遇、健康发展,这是几任领导班子认真思考和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学校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特色强校之路,“依托装备制造业,立足龙江区域发展,服务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以机电类优势学科主导多学科发展,以产学研联合打造优势、服务社会,培养具有科技研发和工程实践能力的现代工程师以及创新型、复合型管理人才”作为学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办学特色,已经为全校干部教师所认同。特色要靠历史积淀,特色更需要精心培育。

⁹ 《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5/16期

一、走特色强校之路是具有行业背景地方高校的必然选择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满足社会需求是走特色发展道路的外部动力。目前，我国正处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历史阶段，工业化发展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强劲的势头。为适应工业化发展，加快经济方式转变，国家将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大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将长期保持旺盛的态势。近期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内涵发展和提高质量上要有新的突破，高校要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纲要》的颁布为高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起跑线上，具有行业背景、学科优势突出、以培养人才为第一要务的地方高校，既面临机遇又面对挑战，发挥自身优势，以特色求发展是这类高校的唯一选择。

走特色发展道路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和高水平领军人才短缺一直是地方高校发展的两大瓶颈，偏居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地方高校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较低的经济水平直接导致地方高校办学经费的严重不足，难以吸引高水平人才。本校地处北疆，气候条件不占任何优势。由于前期基本建设的大额投入，导致背负数亿元贷款艰难前行，还贷负担已经相当沉重，仅靠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难以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教师生活待遇和投巨资用于人才引进。由于教师待遇偏低，“北雁南飞”的现象时常发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这样的条件下，要集中有限的投入发展特色学科和专业，营造宜人的特色环境，引进为我所用的特殊人才和培养社会急需的特色人才，依靠对行业和区域地方经济的特色服务求得支持和自我发展。

区域经济的振兴与发展为地方高校提供了少有的发展空间。地方区域经济的振兴与发展，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高校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以黑龙江省为例，国家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投入4万亿元拉动内需，实施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了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平稳较快发展和全面振兴措施，黑龙江省出台了高等教育强省建设规划，围绕规划目标，实施黑龙江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重点建设“五个一批”，全面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总体水平。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建设规划。各项规划的落实，离不开科技支持和人才的支撑。对于哈尔滨理工大学这样一所服务领域涵盖面宽、产学研为重要载体、机电学科优势特色比较突出的工科大学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学校已被列入黑龙江省高教强省建设规划10所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列，一些学科被列入重点建设范围；国家大学科技园区扩展建设项目已正式列入省8大经济区建设规划和市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这些都为学校提供了更宽广的发展平台。

二、发挥行业和区域优势，培育新的办学特色

1. 以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突出人才培养特色

特色人才培养是特色办学的根本。注重基础、崇尚实践、培养学生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是学校多年形成的人才培养特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纲要》精神，按“卓越工程师教育培育计划”要求，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规格分类

+专业方向分类”的多样化人才培养理念为指导，合理构建人才培养框架；以社会需求目标为导向，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课程体系，以“构思、设计、实现、运作”为主线，逐步实现专业知识的集成和课程的模块化；加强产学研合作，构建“两段式”工程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工业化素质；跟踪产业或社会发展，建立“专业方向”和“课程内容”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在教学计划中融入“创新创造”课程和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课外创新实践平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探索采用研究性以及“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改变传统考核方式，改革教师培养和使用机制，改革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体系，为培养特色人才奠定基础。

2. 以特色优势学科建设为核心，以科学研究为平台，凝聚队伍，强化学科特色

以特色优势学科建设为核心，搭建科研平台，牵动学校整体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为此，学校要优先建设“高电压与绝缘技术”国家重点学科，紧紧抓住纳米电介质材料研究这一国际前沿研究方向，确立在工程电介质材料与应用技术领域的国内学术领先地位；重点建设电气工程等4个省级特色优势学科，增强对全国机电行业和区域经济的特色服务能力；加强仪器科学与技术等信息学科建设，将其人才培养优势孕育发展成学科建设优势，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期信息化对工业化引领作用中对人才的需求；注重人文社科专业与学科建设，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互补，适应综合素质教育的需要，满足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学生入学、就业的多方位需求。

围绕特色学科建设，以科学研究为平台，着力建设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以纳米电介质材料研究、高压电缆材料研究、绝缘监测技术研究、大型发电机物理场研究、节能电机研究、混合动力技术研究等推进高电压绝缘技术和电气工程学科整体实力的提高；着力建设好省工程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机械工业联合会重点实验室，以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专项科技攻关项目为契机，提高机械工程学科的行业服务能力和国内知名度；建设好“高新技术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省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提高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基础研究能力和政府咨询服务能力等等。

学科建设的根本是支撑学科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坚持“稳定用好、培养提高、积极引进”的方针，进一步完善教师基本工作量考核制度、优秀学科带头人支持计划、优秀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名师工程等措施，通过政策激励和制度约束双管齐下，实现师资队伍水平的整体提升；放宽眼界，锁定目标引进学校急需的学术领军人物和高层次人才，解放思想，资源共享借用学科建设急需的智力资源；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团队、教学创新团队和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以重点团队建设带动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唱响以人为本的队伍建设主旋律，真正落实教师的主体地位，努力创造人才备受尊重、人才用武有地的优良环境。形成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领军人物，以龙江学者、各级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

3. 以国家大学科技园和校企合作研发中心建设为载体，深化产学研合作，形成社会服务特色

要把服务行业、服务地方区域经济作为个性化发展的切入点，形成服务特色。目前，学校国家大学科技园扩展建设项目已正式列入省八大经济区建设规划和

市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我们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打造园区精品，发挥学校的行业特色优势，为黑龙江省地方经济、全国制造业及社会发展服务。充分发挥园区的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大学生创业基地、企业研发中心聚集地和高水平人才重要栖息地功能。按照“政府引导，三方合作，三区联动，公司化运作”的模式，一期工程依托学校机电类优势学科，以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软件外包人才培养与培训基地为特色建设；二期工程依托学校化工类学科和周边院校的相关学科，以化工制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及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为特色建设。主动适应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需要，分批组建20个校企合作研发中心，以此为重要载体，推进学校科技力量融入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多项高等级课题的支持下，尽快在相关企业形成影响力。筹备组建产学研联盟，积极参与“电磁测量与仪器”等国家级和省级产学研联盟。

4. 以完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为手段，培育有利于学校健康发展的环境特色

完善现有内部管理体制和机制，重点解决科学决策、自觉执行和有效监督问题。各项规章制度要充分体现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的基本框架；充分体现严格的岗位设置管理和严明的绩效考核；充分体现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广大师生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对各级干部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明确要求，提高干部服务师生的自觉性；充分体现和谐校园建设的总体要求，营造健康和谐的干群关系和师生关系，确保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和人人能干成事。为了解决债务负担过重问题，既要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和各种专向资金支持，又要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引进企业和民间资本投入办学，同时要充分利用丰厚的校友资源筹措资金，形成办学多渠道投入的机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重点保证教学条件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民生改善。¹⁰

● 经验借鉴

从欧洲模式到美国模式：欧洲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趋势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欧洲各国及澳大利亚纷纷启动博士培养模式的改革，主要表现为以下趋势：研究生院制度逐渐扩散，新的博士项目和质量标准相继涌现，跨学科、跨机构培养博士生兴起，指导方式从单一导师制走向联合导师制，博士培养更加注重训练过程，逐渐融入通识因素，其总体趋势是从“欧洲模式”转向“美国模式”。中国博士培养机制的改革在很多方面与欧美的趋势相一致，但在强化学术训练、推动跨学科博士培养、提高国际化水平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迫切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关键词：博士教育，培养模式，改革新趋势，制度同型

在西方博士教育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研究型博士的培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或模式，一种为“欧洲模式”（又称“德国模式”），一种为“美国模式”。在美国模式中，博士生在正式提出论文研究问题、写作研究计划书之前需要选修

¹⁰ 《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7期

大量的课程，接受较为系统的学术训练，系统了解相关学科和研究方向的理论和方法。在欧洲模式中，博士生被视为独立的研究者，通过与导师的交流掌握学科方法、学科文化与学科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篇在知识上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博士论文，没有正式的课程，更遑论系统的培养计划。

最近十多年，博士培养的“欧洲模式”似乎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代世界的需要，欧洲各国都在对其博士培养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2005年2月，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博士教育研讨会提出了博士教育改革的十大原则（“萨尔茨堡原则”）。根据“萨尔茨堡原则”，当代的博士生学术训练必须适应新的挑战，博士培养不能仅仅面向学术界，而是应当面向工商业界、政府等更广泛的领域，为此，必须继续坚持“多样性”的原则，探索博士培养与博士类型的新形式。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跨学科的知识情境，为此必须进一步促进跨学科的博士培养。

欧洲博士培养模式的转型与改革已经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但他们往往只关注改革的某一个方面，并没有从中提取关于这一改革的“整体性图景”。这些趋势与改革之间通常是彼此联系、环环相扣的，因此非常有必要将这些趋势统合起来讨论，以描绘欧洲博士培养模式改革的宏观图景。欧洲博士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是从“欧洲模式”转向“美国模式”。

一、研究生院制度进一步扩散：博士培养趋于结构化

高等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尼夫（Guy Neave）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欧洲博士教育改革都是围绕一个核心的模式——美国研究生院——来开展的，只不过各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一些改变。法国的Ecoles Doctorales、英国的Graduate schools、荷兰的Onderzoeksscholen、德国的Graduierten Kolleges尽管名称不完全一致，但或多或少都反映了美国的影响。在美国模式的影响下，德国、法国、英国、丹麦、荷兰等遵循欧洲模式的国家纷纷建立研究生院，试图为博士生教育提供更加结构化的制度环境。

1991年，英国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主席马克·理查德（Mark Richmond）倡议英国高校建立研究院（Research School），以避免研究生教育的经费和资源为本科教育所侵占。到1995年，英国共有33所大学和1所学院建立了研究生院，还有23所大学拟定了设立研究生院制度的明确计划。研究生院的模式根据大学规模和博士生数量会有所不同。如果博士生数量足够多的话，研究生院建立在系科基础之上；博士生数量比较少时，会以大学为单位建立研究生院。在英国的34所研究生院中，有一半多是美国模式，即一所大学只有一个研究生院。同时，有12所研究生院是以系为基础的，有3所研究生院是以博士点为基础的。2003~2004年，在英国研究生教育理事会的一次调查中，被调查的96所大学有2/3设有研究生院。

德国在1988年就成立了15所研究生院（Graduierten Kolleges）。20世纪90年代初，在科学审议会和大学校长会议的支持下，研究生院作为一种制度正式推上德国博士教育改革的议程。1990年德国研究会（DFG）开始资助研究生院的发展，到2008年，德国共有238所DFG研究生院，其中包括57所国际研究生院。从专业分布来看，66所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28%），72所属于生物和医学领域（30%），67所属于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28%），33所属于工程和计算机科

学领域(14%)。根据一项估测性研究,到2004年,只有大约10%的博士生在DFC的研究生院中进行博士研究。

在研究生院制度的扩散方面,北欧地区的步伐稍慢,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也开始大量建立研究生院。芬兰第一所研究生院于1995年开始正式运行;到2001年,已经建立了108所研究生院;到2007年,增长至140所。在丹麦,直到20世纪末期,还没有一所研究生院,但到2004年,已经有大约150所研究生院,并且数量还在增长,到2006年,有一半以上的博士生在研究生院注册。

欧洲大学联合会2007年的报告表明,被调查的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中有30%的大学已经建立了研究生院或博士生院/研究院。

研究生院制度在欧洲的扩散体现了博士教育的“结构化”趋势。在非结构化的环境也就是传统的学徒制模式中,博士生导师会选定自己的学生,并且让博士生参与自己的研究以使后者获得科研训练。更重要的是,博士论文的成绩是由导师来决定的。和传统的学徒制模式相比,研究生院的建制具有以下优势和功能:1)提供一个相互激励的研究环境;2)提供一个清晰的行政结构;3)确保博士教育数量达到临界规模,克服单一部门博士生孤独无助的状况;4)为低年级博士生和高年级博士生的交流提供平台;5)支持并促进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的学术指导;6)使博士生的招生录取规则透明化、公开化;7)提供教学以及可迁移技能的训练;8)提供更多的职业生涯发展机会,包括学术指导与资助的机会;9)确保质量保障与监控;10)增加国际合作、跨部门合作与学生流动的机会。

二、新的博士项目和质量标准相继涌现:博士培养呈现多样化

欧洲博士教育的多样化大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传统的哲学博士学位之外出现了新的博士学位类型,如专业博士、项目博士、新制博士等;二是博士质量评价的多元化和标准化,传统的研究型博士要关注其学术性的评价,诸如对学科知识和学术创新的贡献、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掌握程度,而专业博士更强调实践性知识以及博士对专门实践领域的贡献。

专业博士起源于北美。1894年,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在尚未设立哲学博士学位(Ph.D.)之前就设立了教育博士(Edd),这是现代专业博士教育的开端。最近20年来,专业博士学位在英国等国迅速兴起和发展,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教育、商业、工程、法律、心理、医学、人文、设计和建筑,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中令人瞩目的一次大变革。

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大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临床心理学专业博士于1989年出现,这是一种准予实践的标准化证书,由英国心理学会认证。1992年教育专业博士(Edd)和工程博士(EngD)开始推出。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迅速增长。根据英国研究生教育理事会2005年的调查,英国攻读专业博士学位的在读博士生为6676名,其中教育学1864名,临床心理学1775名,医学1395名,工商管理434名,工程学301名。仅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就有150名攻读教育博士的在读学生。

事实上,学术型博士与专业博士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囊括当代博士教育的丰富性。除了专业博士,新制博士(New route PhD)、实践型博士(Work/practice-based PhD)、项目博士(Doctorate by Project)、出版博士(PhD by

publication)、课程博士 (taught doctorate) 也在悄然兴起。

博士教育培养模式多样化的主要驱动要素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知识经济的推动下，教育和研究训练不再是纯粹知识探究的旨趣，知识的应用范围不断扩散，政治、市场和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呈现复杂化，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趋于多样化。第二，社会对博士教育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博士教育要面对更多的目标诉求，需要提供多样化的博士项目和训练模式。第三，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变化，博士候选人在学术机构内外的就业能力、以及个人和社会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成为新项目发展的催化剂。

三、跨学科、跨机构培养博士生：博士培养模式走向合作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新知识的发现、新理论的提出与技术创新越来越要求研究者跨越传统学科的边界，对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创造性的整合。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发出强烈的信号，要求博士生具备跨学科的知识 and 能力。《重塑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研究生教育》报告中提出，“研究生教育应该为学生准备更多的跨学科、合作性和全球性的就业市场”。尼奎斯特 (J. Nyquist) 提出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备的 10 项基本素质，其中一条就是“有跨学科研究能力，有跨机构合作能力，有在公私立部门工作的能力”。

一般来说，博士教育是围绕某一个具体的学科组织起来的，其主要的任务之一在于培养“学科的传人”，因此跨学科的博士培养模式往往难以实现。尽管如此，欧洲各国仍然不遗余力地在各个层面推动跨学科的博士培养模式，主要路径包括以下几种：1) 通过制度化的研究生院进行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德国、芬兰、丹麦和法国等欧洲国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纷纷建立研究生院，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以跨学科的模式来培养博士生。2) 启动专门的跨学科教育与研究计划。在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卑尔根公报 (Bergen Communiqué) 明确指出大学要提供跨学科的训练。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 (ESRC) 也支持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生从事跨学科研究。3) 大学通过让学生选修其他系的课程以及吸引其他学科的教师加入导师委员会来鼓励并实施跨学科的研究；一些大学还允许博士生注册两个不同的系，还有些大学在研究生院设立了跨学科学院。

此外，为了加强与社会的联系，让博士生为在学界内外就业做好准备，欧洲各国大学发展了与研究所或工业界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模式。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一些大学开始和工业界联合培养博士生，或者通过商业化的研究项目来培养博士生。例如，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 (Helsinki) 为 60 名选拔出的生物科学专业博士生提供有关生物企业和可迁移技能方面的课程，并组织博士生参观企业，使学生提前和未来的雇主建立联系。一项挪威的调查表明，2002~2005 年间的挪威博士学位获得者有 7% 受工商业界资助，高达 20% 的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工业界有过合作。

为了共享资源和促进学术交流，丰富博士生的视野，一些大学开展了与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模式。例如，2000 年，哥廷根大学和马普研究所高级科研部门合作建立了分子生物和神经科学的硕/博士项目 (MSc/PhD programmes)；瑞典卡罗林斯 (karolinska) 学院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于 2006 年开始联合培养生物医学博士，这种大学与非大学机构的紧密合作对提高博士培养质量大有裨益。

四、从单一导师制到联合导师制：博士生指导实践趋于结构化

在美国，博士培养一般实行导师小组制，博士生除了获得第一导师的指导之外，还会得到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指导，这与欧洲的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在德国，博士生很少从导师之外的教师那里获得指导。然而，很多欧洲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传统的一对一的“导师—学生”（师傅—学徒）的指导方式已经无法胜任博士生的培养。超越传统的学徒制，走向联合导师制是当前欧洲国家导师制度改革的一大趋势。

目前欧洲许多大学最主要的改革是联合导师制，即实行双导师制、多导师制或导师小组制度。多导师制包括 2~3 位导师，其中 1 位是主导导师。一位导师负责博士教育的管理和训练，一位负责研究过程，后者可以是来自工业界等非学术部门。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2009 年发布的《博士生训练与发展准则》鼓励双导师制或导师小组制，尤其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博士生，导师可以是跨系或跨部门的联合，而新导师或经验不足的导师也应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联合导师。丹麦 2006 年博士教育评估小组还建议，副教授或博士后应当被允许担任项目导师（project supervisors）或者副导师。

此外，欧洲各国为了保障指导质量，采用了签署合同或者设置导师管理委员会的方式，以促进指导实践的结构化和透明化。以法国为例，博士生、系主任、博士生院的院长和导师之间会签署一份书面合同，将各方的关系正式化，而且法国的博士生院还规定了其他关于指导的原则，如每位导师指导的学生的限额，每位导师所获公共资助的额度等。

五、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可迁移技能”与“通用性知识”：博士培养融入“通识”因素

尽管现代社会仍需要培养未来的学者和科学家，但博士教育的任务并不仅限于此。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在高等教育部门之外（例如企业、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等）就业。学术界之外的雇主要关心的不是博士传承学科、增进知识的能力，而是他们应用知识、迁移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非学术部门的工作环境中，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组织领导能力也是工作胜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能力，都是传统的博士教育所不重视的。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欧洲各国的博士教育开始进行调整，在博士培养过程中给学生提供“可迁移的技能”和“通用性的知识”。在英国，培养博士生的可迁移技能和通用性知识甚至成为了一项正式的教育政策。英国的研究生教育理事会曾发布规定，要求大学为博士生开设通用性技能方面的课程。2002 年英国政府发布的《面向成功的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Set For Success）要求英国高校为博士生提供可迁移技能方面的训练，随后，英国政府就向各大高校提供了通用性技能训练方面的专门资金。

六、从研究到研究训练：博士培养更注重课程与能力培养

在传统的欧洲博士教育体系当中，博士教育本身就被看作是学术研究，而不是研究训练。换言之，人们认为博士生是来从事学术研究，而不是来接受学术训练的，在开始博士教育时，博士生已经被认为是比较成熟的研究者。基于这一原则，博士点并不会为博士生提供系统的课程。最近 20 年来，这一传统受到了挑战，博士教育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是接受学术训练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

措是在博士教育中融入课程的因素。

英国社会科学研究训练的主要资助者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 1987 年发布的《温菲尔德报告》(Wintleld Report) 建议英国模仿美国博士教育模式, 增加正式化的课程, 试图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解决很多博士生无法完成学业的问题。根据该委员会的要求, 在其资助的博士项目中, 博士生在前两个学期要修习正式的课程, 尤其是方法论方面的课程, 包括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通用性研究技能和可迁移性技能训练等。英国最近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新制博士 (New-route PhD) 和传统哲学博士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包含较多的课程。

同样, 在德国的传统培养模式中, 博士生是“只在大学注册的人”, 没有专门为博士生设置的课程。但是, 2002 年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将博士教育分为三部分: 课程、研究训练和撰写博士论文。德国研究生院的资助机构德国研究理事会规定, 研究生院设置的课程分为必修课、限选课和选修课, 每周或每两周要有一次讨论课, 还有些研究生院要求博士生每周应修读 4~6 学时的课程。根据欧洲大学协会 2010 年发布的《2010 年趋势》报告对 821 所欧洲高校的问卷调查, 在博士阶段提供课程的高校比例从 2007 年的 49% 升到 2010 年的 72%,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欧洲开展博士教育的大学已经开始将课程视为博士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七、结论与启示

可以看到, 欧洲各国博士教育的改革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美国博士培养模式的影响, 例如研究生院制度的建立、博士课程的引入、联合导师制等等。我们有理由说, 欧洲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总体趋势是从“欧洲模式”转向“美国模式”, 换言之, 博士教育体系正在走向“制度同型”。不过, 我们也要看到, 这一模式的转换并非完全是“模仿”和“照搬”, 欧洲的研究生院 (英国除外) 与美国的研究生院在很多方面差别甚大。此外, 还有一些趋势是欧洲和美国在同时推动的, 例如跨学科的培养模式、国际化的趋势等。

从欧洲模式转向美国模式的趋势是欧洲博士教育在经历大规模扩张之后被迫进行的调整。正如研究生教育研究专家斯图亚特·布鲁姆 (Stuart Blume) 所指出的那样, “北美模式的吸引力在于, 与通常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 它似乎能够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确保高效率的和有效的对研究者的训练”。

中国的博士培养模式既不是纯粹的美国式, 也不是纯粹的欧洲式, 而是杂糅了两者的特点, 并有自己的特色。尽管如此,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 中国和西方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共通的,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亦然。就此而言, 欧洲各国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启示。

事实上, 我国博士培养机制的改革在很多方面与欧美各国的趋势是相一致的, 尤其体现在专业博士学位 (尤其是教育博士学位) 的推广、导师制的改革、公派留学政策的推进、大学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博士生等方面, 这些改革在某些方面就体现了欧美博士教育改革对我国的影响。尽管如此, 我们在很多方面仍然落后于欧美的步伐。

首先, 从课程构成来看, 目前国内高校的博士生修读的课程学分数量平均为 15 学分, 由学位课和非学位课组成, 学位课中公共课程即政治理论和英语的

学分数占总学分的 1/3 到 1/2；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通常为 3 门左右，选修课占较小比重。根据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对我国 2 万多名博士生的问卷调查，认为博士课程量“很大”和“较大”的比例之和仅有 20.1%，认为博士课程面“很宽”和“较宽”的比例之和仅有 41.2%。师生普遍认为我国博士生课程的修习数量偏低，构成情况也不令人满意，公共课比例大，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比例偏低，选修课的数量不够丰富。与欧美各国普遍增加博士课程、强化学术训练的趋势相比，我国博士课程的设置已经不能满足博士培养的需要。笔者认为，今后应当将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区分开来，构建博士教育阶段的核心课程。

其次，在跨学科博士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支持方面，我们已经远远落后欧美各国。前面已经提到，欧洲各国在推动跨学科博士培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而我国目前尚未看到这方面的强有力的制度推动或经费支持。¹¹

欧美大学组织模式比较研究

摘要：以欧美大学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术组织、学术权力模式为研究对象，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简要梳理“三模式”——学院模式、讲座模式、系科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从权力重心、公共性、民主化及有效性等角度分析比较“三模式”差异；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权、科层、委员会、职业化的共性特征及发展趋势，以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大学组织，英国模式，德法模式，美国模式

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及其合作者针对上世纪 60 年代末西方高教界出现的大学危机，于 70 年代组织了跨国性的学术考察，首次提出英国模式、欧陆模式和美国模式，即早期的学院模式、近代的讲座模式以及现当代的系科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伯顿·克拉克参与编写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及专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落户中国，国内学者即纷纷就此领域展开研究，挖掘出一些颇具价值的研究资料，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笔者拟在对中世纪以来欧美大学学术组织三种形态生成进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欧美大学三模式差异，指出欧美大学学术组织的共性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为东亚尤其是中国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参考。

一、欧美大学组织模式的历史演进

欧美大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形成了差异较大的学术组织与学术权力模式，其经典性学术组织经历了一人一票、共同参与的学院模式，教授主体、国家控制的讲座模式，以及行政科层、分权制衡的系科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

1. 学院模式。在欧美大学发展史上最早的学术组织模式是中世纪的学院制。学院制有其特定涵义，其核心内容是以学院权力为大学权力主体；学院成员共同管理大学诸项事务，就大学学术及其他问题共同协商、集体决策，大学校级层次聚合能力差，控制能力弱，形态松散。该组织制度因学院在组织体系中占有绝对地位，亦因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以一贯之地继承，故将其称为学院模式或英国模式。

¹¹ 《外国教育研究》2010 年 第 8 期（作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沈文钦 王东芳）

2. 讲座模式早在马其顿帝国时期,托勒密一世即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利亚大学设置语言学、修辞学、哲学等数个讲座。19世纪初期,德国新建柏林大学鉴于国家对大学的过度控制,在继承古典“讲座”的基础上,创建新的大学组织形式及学术制度——讲座制,即在大学等机构为研究教育之目的而备有的由教授等必要的人员组成的机构。日本学者海后宗臣认为,讲座制主要是指作为大学基础组织单位的一种制度,这种组织单位主要依据学问和学科类别加以区分,在这一意义上,讲座制是将学问领域制度化的一种单位,以此构成大学组织系统的总称。

3. 系科模式。19世纪前期,为使大学更加适应外部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大学内部的民主诉求,美国大学在总结讲座模式诸多弊端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大学组织制度——系科制。1825年哈佛大学管理委员会对教学组织和课程进行重大改革,在哈佛学院率先建立以系科为基础的大学学术管理体制与学术制度,系是基层学术组织,教师以系为单位重新组织起来,实行校、院、系三级行政管理,辅之以委员会。因哈佛大学以学科为单位设系,故将此模式称为“系科制”或“系科模式”。至1900年,系在全美大学已占有牢固地位,成为适应大学学科发展和专业培养需要的基本学术单位。系科制形成后发展迅速,二战及欧洲大学风潮后,欧陆大学纷纷实行大学体制转型,即由讲座制转为系科制或采取讲座、研究所与系科制并行的学术管理制度。

二、欧美大学组织模式的差异性比较

因大学组织内部权力结构要素的构成比较复杂,故不宜用简单的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等类似概念做简单优劣评价之分析。应该说,“三模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据不同的地位,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一) 权力重心比较

通过对欧美大学学术组织结构进行综合考察,可知目前美、英、德三种模式权力重心分属于大学的上、中、下三层。美国大学学术组织模式为系科制,故学界的部分研究者即认为系科模式的权力重心一定在系、学科,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大学的确以学科为单位设系,系是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实行校、院、系三级行政管理,并与委员会相互制衡,共同管理大学学术事务,系在决定人事、课程和研究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系科模式的权力重心在上,即在校、院,而非大学底层,这是由行政体制或科层制所决定的,加强顶层设计与顶层管理为科层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宗旨。

在中世纪,英国大学学院模式的权力重心居大学底层,因中世纪大学纵向系统仅存校、院两级结构。“在牛津,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牛津大学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学院权力乃大学学术权力之重心,学院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负责制度的制定、课程的编制、教材的选择、经费的使用以及教师选聘等工作,具有较强的自治性,大学相对松散,尤其是英国大学更加松散,一切权力由学院掌控。二战后,英国以美国为师,大学纵向系统亦为校、院、系三级,学院仍为大学权力主体,但从大学纵向权力系统看,重心已移位于系统中层。

德国讲座模式的权力重心居大学基层及教授手中,讲座教授享有诸多权力。我国学者符娟明曾将讲座制描述为:“是在大学里定出教学研究的专攻领域为其教学研究方向,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教师进行授课与科研的制度。一个讲座往往代

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学科方向，是大学的教学、科研、财务、人事、行政的基层单位。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两名有学位的助教就是一个‘讲座’的基本成员。此外还可以配备1~4名行政助理、教学辅助人员或技术实验员，由教授领导。每一个‘讲座’还可领取按教学计划呈报审批的教学科研经费，由‘讲座’自主支配。若开设‘讲座’专题之外的议程时，由专任副教授或专任讲师担任。有关该‘讲座’的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科研的费用，甚至‘讲座’内的人事调动等，也都由‘讲座’自行负责安排。”讲座教授（讲座主持）集各种资源、各种权力于一身，大学、学院无权过问。

20世纪60年代末，欧洲大学风潮后，德、法等国对大学结构进行改革调整，或以系代讲座，或讲座与系、研究所并行，但讲座遗风犹在，大学教授在大学学术事务管理中拥有绝对权力。有研究者对此指出，欧陆大学的教授是自己的教授，即教授自治。

（二）公共性比较

“公共性”，一般是指“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公共性的实质是多元参与。大学学术权力主体对权力的行使，是以大学整个学术组织共同发展的名义进行的，成员对学术公共事务的评估与裁决是大学学术组织、学术权力的核心功能。

学院模式与系科模式下的大学学术组织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早期学院制期间，因学院规模小，教师、教授数量有限，故大学所有成员均为教师会或教授会成员，大学以集体的形式参与学术事务决策。

近代以来，因大学规模扩大，大学学者普遍参与的程度有所降低，但大学各部门、各机构、各学科的每一个体通过推选代表与被推选代表的方式有权利、有机会成为大学各级委员会成员，参与大学各层级委员会的学术决策，故具有普遍的公共性。尤其是美国模式的系科制，作为学院制与讲座制的衍生物与混合体，改变了讲座教授一人独裁的传统，承认组织内部每个教师之间的平等地位，每个教师有权参与有关教学计划、课程、师资配备及其他事务的决策，系科结构正是基于教师的广泛参与而建立的，系科制反对任何人，包括由选举产生的系主任（任期一般不超过5年）取得对某个学科或领域的课程、方法的支配地位。系主任基本不占有资源，即便占有微量资源，但由于职务的轮换制度，亦使资源分配中的偏失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大学评议会由多方代表参加，代表各方利益，体现民主意识。在一些问题上，系主任必须同全体教学人员商讨。在这类会议上，少数服从多数是进行决策的主要原则。

德、法等欧陆国家大学讲座模式因讲座教授集行政、教学、科研及人事工作于一体，公共性薄弱，私权过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学术资源高度垄断，普通学者难有参与学术决策的机会，教授权威遮蔽学术组织中的弱势个体，成为大学学术组织公共性的巨大障碍。1976年德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教授个人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但大学评议会仍以教授为主体，故教授仍拥有较大权力。

（三）民主性比较

就民主程度而言，传统的学院制民主程度最高，一人一票、集体决策、民

主管理是学院模式的主要特征。所谓一人一票制即教师按行会方式，组成自己的“法团”(consortium magistrorum)，共同裁决大学事务。后来，教师法团演变为“教师会”(facultas)，“教师会”是西方大学教授会或评议会的雏形。“教师会”有权决定学校的经费使用、课程教学、研究方向、教师任用、招生、学位授予和校长遴选等事务。

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系科模式与德国大学的讲座模式民主程度稍逊一筹。美国大学的评议会与教授会等学术组织，学者及其他成员享有普遍的参与权，呈现较强的公共性与民主性。教授集体及其他学者的普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个人权威受限。“与英国相比，教授的统治力量较弱”，“在美国，教授个人和集体这两类权力，没有取得像欧洲大陆和英国模式中那么大的影响”。然等级式的科层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主的成分，所以，民主性略弱于学院模式。德国大学的讲座模式因教授个体在大学中持有重权，“主持讲座的教授一直是教学领域的主宰，一个多世纪来他们还是科研领域的主宰，他们对本学科领域中的助理人员和学生进行控制。这些教授的团体，对学院和大学进行集体统治，主要垄断了课程、教师任用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决策权”。故德国的学术民主仅为教授间的学术民主而已。

(四) 有效性比较

有效性主要由“performance”或“effectiveness”表示，performance 指一个事物的最大功用和效率，是一种事实存在的限度。利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指出：“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的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大学学术权力的有效性一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的直接绩效；二是成员对绩效评价所形成的积极影响。

学术组织的有效性是一难于简单评价的复杂问题，不同学术组织模式的有效性存在一定差异，而相同学术组织模式的有效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亦有所不同。罗兰·沃伦将组织分为四种类型：高度聚合的结构，联邦的结构，联合的结构，社会选择的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限度内，组织结构的聚合程度与效能呈正相关，即聚合程度越高，效能越强；但聚合超过一定的限度后，聚合与效能可转换为负相关，高聚合反呈低效能。从欧美大学学术组织的总体情况看，系科模式属于联邦性质的组织结构，该结构一方面凭借科层式的等级制度在大学学术管理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大学借助委员会于各部门、各学科间合理分权，化解等级制度潜在的身份危机，提高组织效能，此亦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大学中遥遥领先的秘笈所在。学院模式与讲座模式属于社会选择与高度聚合的组织结构，其有效性远不及系科模式。学院模式忽视纵向结构系统的控制效能，难于聚合；而讲座模式的组织结构虽有聚合，但聚合程度过度，即权力高度聚合于大学讲座教授，忽视大学纵向系统的各个层级及组织内部成员的存在价值，故效能最弱。在讲座模式确立之初，因集中的学术管理制度可使讲座中的研究者迅速集结于一个研究方向或一个问题，形成兵团作战态势，扩大了学术影响，为学术组织发展提供强大助力，故具有较大的管理效能；然而在讲座模型形成的中后期，因握有重权的教授有形、无形间压制了学术新生力量的兴起，教授专权弊端逐渐显现，组织日趋丧失“有效性”而开始走向衰落，酿成了“有效性危机”。

造成上述差异的因素固然很多，其中，民族文化、内外环境要求应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英国教育家 E.阿什比曾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哈佛大学第 21 任校长艾略特亦说：“大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在先辈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民族文化的共性特点是追求自由，理性至上，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导致大学学术组织模式具有较大差异。英格兰属于欧洲岛国，岛屿领土的相对独立，使得希腊古典文化与世俗文化在此得以很好保留，并逐渐形成了学院的保守性。“在牛津，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牛津大学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在巴黎，这些学院不久就陷入对巴黎大学的依赖状况之中，这种依赖尽管开始时还比较温和，最终却变得非常严重。”德国模式因生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此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滥觞于 19 世纪，讲座模式即国家主义与大学自治传统有机地结合的产物。美利坚作为欧洲各国的移民国家，一直奉行实用主义，它既是各个时期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亦为美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实用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如同“润滑剂”一样，影响着美国人的观念。丹尼尔·布尔斯廷指出：“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形成一种习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接受似乎业已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概念。他们往往把现实的事物作为尺度，来衡量事物发展的应有情况。”灵活、实用的价值取向使美国人从不拘泥于传统与教条，而是崇尚创新并热衷于实践性探索。

三、欧美大学组织“模式”的共性特征及发展趋势

从欧美大学学术组织、学术权力发展的趋势看，分权、民主、公平是“三模式”的基本理念，在此理念支配下，大学逐步建立起科层、委员会、大学校长职业化的三维体制制度，呈现纵横交错的组织形式与权力结构。

1. 科层。科层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原为中性词，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提出，主要用于表示一种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高效组织形式或组织结构。科层组织的基本特点是：权责分明、等级严格、纪律严明、照章办事，各组织及成员按分工专精于自己的岗位，履行各自的职责，各层次之间遵循等级原则。韦伯认为，科层是组织管理的最佳方式，是最合理、最有效的管理手段。大学组织科层化管理是大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由于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与学校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大学运行速度呈递减之势。为提高大学办学效率，制度化、效率化的科层制成为大学的首选方式。美国随着系科制的建立，率先将科层式管理引入大学学术组织，大学科层制的根本诉求在于实现大学学术管理的目标性与效率最大化。有人认为，科层制强调权责清楚、等级分明、纪律严格，这与大学精神相悖。其实，西方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存在的问题，并非因科层制所引发，西方大学的科层化管理是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科层现象，其管理行为主要发生在决策后，且委员会在横向结构上对科层化权力予以制衡，所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既关照了委员会的民主，亦发挥了科层制的效能。科层制不等于集权制，然而，科层制若无委员会等横向权力制衡，的确易导致分权的形式化与集权制之生成。

2. 委员会。委员会是中世纪大学学术管理的遗风，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组织保持对大学学术事务的直接参与及决策。各种名目的教授集体组织在选举校长、聘任教师、开设课程、颁发学位等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委员会制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实行一人一票，共同参与，民主决策，尤其是教授集体在学术问题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委员会主要体现在大学横向权力结构中，西方大学学术权力

的横向结构有所不同。法国大学学术权力的横向结构一般由理事会（或校务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学习和生活委员会组成；英美大学由理事会、校务委员会、评议会组成；德国大学学术权力横向结构包括校务委员会（校长委员会或小评议会）和评议会（大评议会或代表大会）。大学委员会可概括为两种类型：一为首长负责制，一为委员会负责制。所谓首长责任制是指校（院）长为大学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代表，有最终决策权；所谓委员会负责制，是指大学学术管理以委员会为主体，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有审议权和决策权。委员会负责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委员会主席与大学校长（或院长）分离；另一种是委员会主席与校长合一。前者可称为“分离型”委员会负责制，后者称为“统合型”委员会负责制。

目前，西方大学多以“统合型”委员会管理大学学术事务。统合型委员会负责制的优长在于效率高，首长与委员会摩擦小，便于形成统一意志，但首长权力往往过大，影响学术民主，最后可演变为首长负责制，与委员会主旨相悖。当然，委员会制亦非一剂灵丹妙药，决策环节多、人员分散、难于集中、决策费时、影响效率是其不争的劣势，民主形式下隐藏的小集团局部利益的纷争，亦为不言之事实，此亦为当代大学学术组织运行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两个复杂问题。

3. 校长职业化。大学校长专职化是指个体一旦被任命为大学校长，即脱离原有角色，而以“校长”身份专精于岗位，履行校长职责，全权负责行政工作，执行最高权力委员会形成之决议。在西方中世纪，学生型校长很快为教师型大学校长所替代，随着西方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学术组织日益复杂，人们对效率予以高度关注，故大学校长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越发关键，由此，大学校长专职化已为西方大学所认同。

大学校长专职化主要与校长学术化相对，其优长主要有二：一是与学术分离，与学术分权，避免与学者争利；二是可为校长提供更充沛的时间与精力。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是高校内部管理体系的核心人物，是校内外关系链条的传输中枢，因此，校长的办学理念、管理素质、管理艺术、管理精力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大学的发展方向与办学质量。所以，大学校长的身份与角色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美国大学已实现校长专职化，欧陆国家的大学校长亦逐渐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1976年，德国颁行《高等教育总纲法》，其中即要求大学校长专职，以加强行政管理。目前，“绝大多数州的大学已设立了一名专职校长，由大学评议会选举，任职6~9年。校长负责处理大学的学术、行政和经费事。”有人认为，如大学让位于管理人员或校长脱离学术活动，其可能的后果是大学学术权力更加弱化，学术权力旁落。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大学校长专职化与学术权力弱化并非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大学校长专职化一方面可以提高管理效率，使校长有更多精力管理大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大学校长权力，避免资源兼占。¹²

¹² 《中国高教研究》2010年第9期（作者：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赵俊芳）